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论金庸武侠世界之世俗化——以  
《鹿鼎记》为中心

A Study on the Secularization of Jin Yong's Martial Arts World —  
— Centering on *The Deer and the Cauldron*

余玉霞

YU YUXIA

17ALB06805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OCTOBER 2020

# 目次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1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3
一、研究范围.....	3
二、研究方法.....	4
第三节 文献回顾.....	5
第四节 论文架构.....	8
第二章 抗清夺权：武侠世界的世俗形态.....	10
第一节 江湖之本质.....	10
第二节 政治性门派.....	12
第三节 “侠”之起源与确立.....	16
第四节 “侠”之变质.....	19
第三章 世俗侠客：新武侠世界的基石.....	24
第一节 武侠世界的挽歌.....	24
第二节 世俗侠客的诞生.....	25

第四章 结论.....	31
引用书目.....	34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余玉霞 YU YUXIA

学号：17ALB06805

日期：2020年11月26日

论文题目：论金庸武侠世界之世俗化 —— 以《鹿鼎记》为中心

学生姓名：余玉霞

指导老师：陈明彪师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鹿鼎记》作为金庸的封笔之作，一直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部分学者将其奉为金庸武侠小说的巅峰之作，部分学者因主人公韦小宝无武无“侠”的特质，而称之为“反武侠小说”。金庸曾言：“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神雕三部曲”中就已显现主人公从神性英雄转变至人性英雄的轨迹，笔者称此转变为“世俗化”，而本文所欲探讨的两大课题分别为：一、金庸为何世俗化自身所建立的武侠世界？世俗化的侠客呈现何等形态？如何证明金庸小说中的世俗化行为？二、韦小宝在金庸的世俗化行为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有何象征意义？本文尝试以文本细读法、文献研究法解答以上问题。

构成武侠世界的元素繁多，然最主要的不过是江湖门派、侠客豪杰、侠义精神三者，故只要得知这些元素的本质，及其在武侠世界的意义转变，即可窥探武侠世界的世俗化，此乃本文第二章的主要内容。经过剖析，发现《鹿鼎记》的三大帮派天地会、沐王府、神龙教皆一改以往江湖门派对庙堂的厌恶态度，竟均以跻身庙堂作为帮会的最高追求：天地会和沐王府为争夺抗清领导权而费尽心力，神龙教则与多方政治势力联合，意欲瓜分中国土地，称霸一方。然以替天行道、保家卫国、爱民护民为信仰的侠客，亦痴迷于名誉、金钱、权力、

爱情等世俗之物，甚至站在“政治正确”的至高点，以“反清复明”为旗帜，来合理化自身追逐政治权力的野心，置世态民生于不顾，此皆宣示着武侠世界的世俗化，甚至是武侠世界的堕落。

随着江湖权力之争的激化，以及法治社会的诞生，武侠世界消亡乃是必然的结局，为避免武侠世界走向毁灭，金庸唯有加快世俗化的进程，以期在结局来临之前重塑武侠世界，并塑造能够顺应时代，且符合人性的新型侠客，即韦小宝。然则，仍有诸多读者以武功低微、贪财好色、手段低劣、毫无侠义等为由否认韦小宝的侠客身份，故本文第三章的主要内容实是为韦小宝辩驳，以确立其“世俗侠客”的身份，并提出当“利”字当头，为了“义气”而做出无益甚至有损于自身根本利益的“侠义”之举时，方能显其伟大的观点。总而言之，金庸塑造韦小宝，意欲告诉世人：凡在关键时刻能不顾自身利益而挺身重视是非行正义之举者，皆可称为“侠”，而新武侠世界的出路就在世俗世界之中，未来可能会是一个“人人为侠”的新武侠世界。

**【关键词】**金庸、《鹿鼎记》、武侠世界、世俗化、江湖门派、侠客与侠义

## 致谢

斑驳黄旧的学生证，不止一次地提醒我，又走到了离别之季，心中有太多的遗憾与不舍，却不知从何说起。只因疫情肆虐，大学的最后生涯竟无法与同窗度过，对老师的感激之情亦无法当面诉说，好不愧惜。或许是对小说的热爱，在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我并无过多焦虑、痛苦的情绪，相反，竟有些享受，然初出茅庐的我，是绝无可能独自完成论文，期间，我的指导教师——陈明彪老师、母亲余氏、爱人李郎以及同窗好友皆给予我莫大的帮助和鼓励。

最初在《鹿鼎记》版本的选择上，明彪老师为我分析各个版本的优劣之处，着实省下不少筛选书籍的时间；初次阅毕《鹿鼎记》，我却茫然不知该参考哪位学者的研究书籍，是明彪老师向我推荐“金学”领域的权威专家，让我总算有了方向；初步阅毕研究资料，对于论文选题的想法较为分散，无法统一，经过与明彪老师的数次交谈后，方确立研究课题；此后，对论文有何新构思，而无法确认切题与否，我皆会联络明彪老师，而老师也总能给予回答和建议；撰写完论文初稿，亦是明彪老师为我标记错漏之处，使我的论文趋向完整。如今，我终于完成了论文，真诚感谢明彪老师在此期间对我的协助、鼓励及肯定，同时希望我能够成为您颇感自豪的学生。

现今社会凡事皆讲求实用价值，故此许多父母极力反对孩子报读中文系，我很庆幸亦很感激，母亲愿意尊重我的选择，她始终相信我是一个懂得自身追求的女孩。每每归家，她总是为我烹煮最丰盛、最营养的美食，时时熬制补汤，期望我能够以最佳的身体状况面对未来种种的挑战，对她的感激，绝不是一言半语就可表达的。另，我也需感谢我的爱人李郎，他常以读者身份倾听我的论文观点，提出疑问，并运用其所学的历史知识予以建议，对完善我的论文观点

有着很大的帮助。最后，需感谢我的同窗好友，不仅不厌其烦地解答我所有的疑问，还提供我源源不断的信心，让我能够自信地前行。

别离总会相见，望相聚之时，我们皆已实现所愿，谢谢各位。



# 第一章 绪论

## 第一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鹿鼎记》作为金庸的封笔之作，一直以来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部分学者认为其乃金庸的巅峰之作，蕴藏人性、历史等丰富的思想内涵，后代难以超越；另一部分学者则将《鹿鼎记》与西方被誉为“反骑士小说”的《堂吉珂德》相比，称之为“反武侠小说”，以韦小宝之道德败坏行为，及其无武无“侠”的特质，说明金庸“反对”与“讥讽”武侠小说之意。“反武侠小说”之“反”，非“反对”、“讥讽”之意，释为“解构”应更近于作者原意。金庸曾言：“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sup>1</sup>”，侠客作为中国人格神的象征，其理想形象一贯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sup>2</sup>”的神化英雄为主。金庸之武侠小说，则旨于解构理想侠客的圣洁形象，着眼于更深层次的个性、自我及人性的探讨，使之突破侠客的类型模式，还原侠客之于人的人性内涵，即神性至人性的转变过程，笔者称之为“世俗化”。

我们可从“神雕三部曲”中的三位主人公窥探其世俗化之迹：郭靖诚实质朴、大智若愚、心地仁厚、大义磅礴，更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奠定者，有如天神；杨过因自小流落江湖，邪气渐长，后与师父小龙女相爱，以致反叛师门，视社会伦理规范于无物，在经历漫长的等待、痛苦与折磨中，终是修成正果，与郭靖共守襄阳，乃半神半人；张无忌个性复杂，较为软弱，无甚英雄

---

<sup>1</sup> 金庸，《笑傲江湖4》（广州：广州出版社，2013），页1452。

<sup>2</sup> 金庸，《飞狐外传2》（广州：广州出版社，2013），页662。

气概，其一生总是受他人影响，被环境支配，无法摆脱束缚。在爱情上，更是与周芷若、赵敏、殷离、小昭纠缠不清<sup>3</sup>，其始终是一位心地善良、性格随和、平易近人，且优缺点并存的人<sup>4</sup>。金庸在此后的作品中，不断尝试塑造更具人性的侠客形象，如《连城诀》之狄龙、《天龙八部》之段誉、萧峰等、《侠客行》之石破天、《笑傲江湖》之令狐冲，皆因为欲所困，陷入迷茫、彷徨、挣扎、恐惧及痛苦之中，以往以征服外在世界为主的神化英雄，逐步变成纠结于内心世界的人。《鹿鼎记》的诞生，完善了人性侠客的形象，亦宣告金庸武侠世界之世俗化的完成，而金庸为何世俗化自身所建立的武侠世界？世俗化的侠客呈现何等形态？如何证明金庸的世俗化行为，即笔者的研究目的之一。

武侠小说，顾名思义，即有武有侠的小说类型。在定义上，可分为“守旧”和“求新”派，“守旧”派主张武侠小说必须“武”、“侠”兼备，否则便不是一部合格的武侠小说；“求新”派则不以武侠兼备作为衡量武侠小说的唯一标准，以梁羽生先生为代表的“侠”派，主张“宁可无武，不可无侠”。以古龙先生为代表的“武”派，则主张“宁可无侠，不可无武”<sup>5</sup>。是以，武侠小说界是允许“有侠无武”或“有武无侠”的模式存在。《鹿鼎记》被称为“反武侠小说”的重要理由之一，乃主人公韦小宝不仅武功低微，且其品性彻底违反侠客内涵，就连唯一符合侠客气质的“讲义气”亦是建立在有利于己的原则基础上，乃无“武”无“侠”的市井小人。然，观之《鹿鼎记》绝不能局限于韦小宝的道德品质来评判是非，应以由其所揭露的武侠社会形态为全书概观；判断韦小宝是否为“侠”，更不能执着于其由生活环境所熏染的流氓气息，应侧

---

<sup>3</sup> 陈墨，《初探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页33。

<sup>4</sup> 陈墨，《初探金庸》，页34。

<sup>5</sup> 陈墨，《赏析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页272。

重于韦小宝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和作为。如前所述，《鹿鼎记》乃金庸武侠世界世俗化的标志，韦小宝作为主人公，绝非是纯粹的市井小人形象，而韦小宝在金庸的世俗化行为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有何象征意义？即笔者的研究目的之二。

本文旨在通过探讨上述二大课题，以说明金庸武侠世界世俗化的形态、原因及出路，并尝试总结此二大课题间的内在关联，从而设法建立一个新观点。

## 第二节 研究范围与方法

### 一、研究范围

金庸于1969年10月24日正式在《明报》连载《鹿鼎记》，直至1972年9月23日刊毕，总共历时2年又11月。在《鹿鼎记》连载期间，金庸便开始修订前作，第一次的修订工程自1970年3月至1980年年中结束，耗时十年。至21世纪，开始第二次的修订工程，直至2006年七月毕，此次主要是文字的修订，情节并未进行大规模的改动。其后，已获金庸授权的各大出版社又在2006年的版本基础上，进行多次印刷。金庸作品版本繁多，但总结而言，金庸武侠小说只有三个版本，即旧版、修订版以及世纪新修版。旧版即1969年至1972年于《明报》连载的原版，亦称“刊本”，并未正式发行刊售。修订版面世之前，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和中国大陆，先是出售各种翻版盗印本，总称“港本”。“港本”的小说内容均是移录“刊本”，除删除了每日连载的小标题外，并无额外改动，故同列为旧版<sup>6</sup>；修订版即1970年至1980年的版本，金庸授权台北远景出版社出版，后由远流出版社接手<sup>7</sup>；世纪新修版即2006年再修订的版

---

<sup>6</sup> 林保淳，《解构金庸》（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8），页33。

<sup>7</sup> 林保淳，《解构金庸》，页37。

本，之后印刷的版本皆属世纪新修版。若论版本优劣，相对旧版，新版的修动幅度极大，包括文字、修辞、内文修饰、回目设计、人物性格、人物关系、情节铺排、史实增录、附注说明等<sup>8</sup>，自是愈新愈佳。本论文则选择由广州出版社于 2013 年出版，即世纪新修版的《鹿鼎记》为主要研究材料，考虑因素有二：一、世纪新修版的内容完整性最高；二、自 2001 年年底，金庸与北京三联出版社的版权合同期满后，广州出版社就成为中国大陆唯一接受金庸授权的出版社。换言之，广州出版社所出版的金庸武侠小说是唯一的官方正版书籍。

本文的研究内容以《鹿鼎记》中蕴含着“武侠世界世俗化”的相关内容为主，将着重分析江湖、门派、侠客与侠义、韦小宝与侠客的故事情节，以期贴合及突出论文的主题思想。必须申明的是，当涉及到历史的相关论述时，均以《鹿鼎记》为主，本文概不以真实史实与之相较。

## 二、研究方法

基于本文是武侠小说研究，故决定采用文本细读法、文献研究法作为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

就文本细读法言，即以文本为中心，根据作品的语境及其展现的意图来发掘作者所欲表达的思想。笔者细读全文后，将会抽取有关“武侠世界世俗化”的情节内容，如江湖、门派、侠客与侠义、韦小宝与侠客进行再次细读与剖析，尝试解答作者隐于文字背后的思想内容。

---

<sup>8</sup> 林保淳，《解构金庸》，页 38。

就文献研究法言，笔者在确定以《鹿鼎记》作为论文研究方向后，便搜集大量文献，对其进行阅读、分析与鉴别，依据现有理论而提出一个新的假设，根据假设进行再搜集、再分析与再鉴别，在整理与重新归类文献的过程中建立研究目标及设计研究内容。这些文献不仅加深笔者对此课题的了解，更给予笔者许多新的观念与想法，对本文的撰写有着很大的辅助作用。

### 第三节 文献回顾

《鹿鼎记》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人物分析与评述、主题探讨、江湖性质分析、侠义内涵探讨、侠客类型、情感分析、文学比较、翻译研究、影视改编研究、版本研究、文化思想研究等，其中涉及“武侠世界世俗化”的研究成果较少，且论述分散，类似的论说均是以外部因素为视角，加以金庸多部作品为例进行探讨，而以内部瓦解为主，辅以外部因素，再专以《鹿鼎记》为中心进行集中论述的学士论文，本文应是首篇。基于参考文献内容散乱，常出现“一纸多论”的情况，难以分类，故此仅以文献类型作别，抽取与本文课题相关的内容，进行简要回顾。

就出版书籍言，舒国治《谈金庸偶得》是直接影响笔者论文初步构思的专著，其提出一个有关侠客的人生命题，即“为何要行侠仗义？行侠仗义的目的是什么？”并指出，“行侠仗义”已逐渐失去其本质，成为概念性的职业化行为，而支持侠客“行侠仗义”的武功，实则是他们为获取武林声誉地位，以及争夺武林至尊之位的重要工具。是以，侠客对于能够迅速使其称霸武林的秘笈，

呈现的态势和思想行为，即是他们真实的品质<sup>9</sup>。美中不足的是，《谈金庸偶得》所论及的课题颇多，因其体制较近于“随笔”，故每个课题均是点到为止，无法深入。余醴《金庸小说的文化与价值研究》解释了江湖与侠客、江湖帮派与政治会党的定义，并通过说明“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即“武力=权力=道理”等的江湖规矩，得出江湖、侠客消亡，武侠小说衰落的论述<sup>10</sup>。笔者并不认同江湖与侠客消亡的观点，具体缘由将会在正文一一论证。陈岸峰《醍醐灌顶：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思想世界》指出江湖人物多是见风使舵、琐屑猥琐、低三下四之流，似郭靖、萧峰等磊落洒脱、心系天下的大侠实则少之又少。侠客们已逐渐遗忘行侠仗义的责任，转而致力于江湖门派之争，争夺宝物、秘笈、求爱、报恩、复仇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醍醐灌顶》亦通过论证，说明韦小宝乃金庸武侠小说武功人间化的最高典范，常以市井手段解救众多武功绝顶之人，突显金庸武功人间化，侠客世俗化的意图<sup>11</sup>。陈岸峰《文学考古：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隐型结构”》进一步肯定韦小宝的侠客形象，认为其只是去掉侠客的“形似”光环，还其屠狗辈面目而已<sup>12</sup>。林保淳《解构金庸》阐释了江湖和侠客的定義、性质与意义，亦解释了江湖三大基本帮派，即教门、帮会、武学门派的性质及区别，更点明《鹿鼎记》除韦小宝外，无一人幸免于“庙堂”政治的牵掣，无论是江湖或是朝廷，人人皆致力于权力争夺，以此说明“江湖”象征“庙堂”的隐喻<sup>13</sup>。陈墨《赏析金庸》指出中国武侠小说的侠客和英雄，均有童

---

<sup>9</sup> 舒国治，《读金庸偶得》（台北：远流出版社，2007），页 26-27、30-31、33-34、65。

<sup>10</sup> 余醴，《金庸小说的文化与价值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页 62-63、71-82、121、131。

<sup>11</sup> 陈岸峰，《醍醐灌顶：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思想世界》（香港：中华书局，2015），页 40、42-44、98。

<sup>12</sup> 陈岸峰，《文学考古：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隐型结构”》（香港：中华书局，2016），页 261-262。

<sup>13</sup> 林保淳，《解构金庸》，页 130-133、142-148、155。

话化或神话化的倾向，这是武侠小说的基本法则，亦是读者的审美定势。《赏析金庸》还提出绝不能以狭隘的民族主义去理解《鹿鼎记》和韦小宝<sup>14</sup>。陈墨《重读金庸》指明韦小宝青木堂香主之位，乃是权力斗争的妥协产物，《鹿鼎记》中，不论是青木堂、天地会、台湾郑王府，还是其他门派或侠客，一生皆争权夺势，就连顾炎武等当世大儒竟也怂恿韦小宝杀康熙、举义旗，置道德观念、人文精神于不顾<sup>15</sup>。

就期刊论文言，高良〈《鹿鼎记》：一个新武侠时代的终结〉指出不论是反对满洲人或蒙古人，实则皆是中华民族的内部战争，并讲明武侠精神若不具备现实意义，其本身就是非主流的，“民族春药”般的旁门左道<sup>16</sup>。柴高洁〈从场域理论看《鹿鼎记》对“江湖”的反叛与再造〉以场域理论为视角，通过传统江湖场域与《鹿鼎记》江湖场域的对比来论证《鹿鼎记》的江湖已被重塑，逐渐透明于现实与政治，从而致使侠客的伤痕累累<sup>17</sup>。但笔者对于其否决韦小宝的义气，认同《鹿鼎记》是为“反武侠小说”的言论是持反对意见的，详细论述将在后文呈现。骆寒超和骆曼合作的〈从武侠英雄的建构到解构——兼论《鹿鼎记》的先锋意识〉认为韦小宝是以超欲望的心态统率种种欲望追求的人，相较于杨过等为欲所困的英雄，韦小宝懂得调节义气良心和自我欲望的比重，使其两全，以此说明韦小宝并非是矫饰的神坛英雄，而是真实的人性英雄<sup>18</sup>。朱艺蓉与王照年合作的〈解读《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侠”形象〉通过“侠”的定义，以及说

---

<sup>14</sup> 陈墨，《赏析金庸》，页 275-276、305。

<sup>15</sup> 陈墨，《重读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页 336、339。

<sup>16</sup> 高良，〈《鹿鼎记》：一个新武侠时代的终结〉，《改革与开放》2014年第19期，页 79-80。

<sup>17</sup> 柴高洁，〈从场域理论看《鹿鼎记》对“江湖”的反叛与再造〉，《华文文学》2018年第6期，页 17-24。

<sup>18</sup> 骆寒超、骆曼，〈从武侠英雄的建构到解构——兼论《鹿鼎记》的先锋意识〉，《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页 163、164-166。

明“武侠”应以“侠”为重，以“武”为辅来论证韦小宝的“侠义”表现，从而总结韦小宝是最为真实，最接地气的“平民之侠”<sup>19</sup>。张乐林〈解构中的建构：

《鹿鼎记》中韦小宝形象的塑造〉通过分析《鹿鼎记》的解构行为，论证金庸是在将“侠”放在“人”的前提下塑造韦小宝的形象，以期将侠义精神传播至市井，让普通人获得实践侠义的可能<sup>20</sup>。金庸〈武侠与人生——在中山大学就聘名誉教授大会上的学术报告及答读者问〉简述了“侠”的发展进程，并给予“侠”之行为一个新的定义，即凡不顾自身利益而做出重视是非的正义之举者，皆可称之为“侠”<sup>21</sup>。

就学位论文言，马玉石《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历程看侠义精神的流变》通过对比金庸作品各阶段的侠客代表，分析总结出侠义的基本精神，对笔者了解侠义精神有着莫大的帮助。杨伦《金庸的江湖研究》极尽详细地阐释侠客和江湖的起源、发展与确立，亦通过解析金庸作品及江湖规矩，揭露江湖的贪欲、阴谋、残忍等，说明江湖已然成为世俗社会的翻版。

#### 第四节 论文架构

本文旨在以《鹿鼎记》为中心，研究金庸武侠世界之世俗化，期望借此解决两大课题：一、金庸为何世俗化自身所建立的武侠世界？世俗化的侠客呈现

---

<sup>19</sup> 朱艺蓉、王照年，〈解读《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侠”形象〉，《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页80-84。

<sup>20</sup> 张乐林，〈解构中的建构：《鹿鼎记》中韦小宝形象的塑造〉，《中州学刊》2009年第2期，页219-220。

<sup>21</sup> 金庸，〈武侠与人生——在中山大学就聘名誉教授大会上的学术报告及答读者问〉，《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页3。



何等形态？如何证明金庸的世俗化行为？二、韦小宝在金庸的世俗化行为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有何象征意义？本文将分为四章对此进行系统性探讨。

第一章为绪论，总共分为四节。第一节首先说明本文的研究动机与目的，简单阐述论文的研究方向。第二节为本文的研究范围与方法，扼要介绍《鹿鼎记》的诸多版本与本文的择书标准。第三节则是文献回顾，选择相关课题的专著、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进行归纳总结。第四节即论文架构，简单介绍本文的研究内容。

第二章为“抗清夺权：武侠世界的世俗形态”，旨于证明金庸武侠世界的世俗化，共分为四节。第一节简要说明武侠世界，即江湖的本质，以便与后文比较。第二节通过分析江湖门派的目的、性质，并与江湖本质进行对比，论证门派中人的心志欲望已从江湖转至庙堂，以此证明武侠世界的世俗化。第三节简述“侠”之起源与确立，以便与后文比较。第四节则论述武林群豪集体心态所表现的实际目的，并与传统侠义精神进行比较，以此证明群豪侠义之心的变质和缺失。

第三章为“世俗侠客：新武侠世界的崛起”，共分为二节。第一节首先解答金庸世俗化其武侠世界的原因。第二节主要为韦小宝辩驳，以确立其“世俗侠客”的身份。

第四章为结论，总结前述，得出总论，说明金庸塑造韦小宝的用意，及新武侠世界的出路所在，并分析本文的局限和未来期望。

## 第二章 抗清夺权：武侠世界的世俗形态

武侠世界，亦称江湖，乃武侠小说家以世俗世界为蓝本，所建立的适合侠客生存的虚构时空，为避免与世俗世界相同，故而添加了现实以外的元素，只要得知这些元素的本质，及其在武侠世界的意义转变，即可窥探武侠世界的世俗化。构建武侠世界的元素繁复，然最主要的无外乎是江湖门派、侠客豪杰、侠义精神三者，故本文将以此作为切入点进行论证（称江湖为武侠世界，是为与世俗世界相较，无作比较之时，仍以江湖称之）。

### 第一节 江湖之本质

范仲淹之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sup>22</sup>”点明中国一直存在着两个社会：一是由国家制定规则、法律及道德，用以约束人们生活方式的“庙堂”；一是由民间自发形成的某些非系统规范的人间社会，即由庙堂管辖的广义“江湖”，而武侠小说中任凭侠客快意恩仇的虚拟世界，即狭义上的“江湖”<sup>23</sup>。简言之，江湖亦分广义和狭义，广义之江湖乃民间社会组织，尚属世俗世界，由庙堂管辖却又与之相对；狭义之江湖是只属于侠客，近乎乌托邦的理想社会，是远离庙堂且与之相抗衡的存在，本文所欲探讨的则是狭义上的江湖。

---

<sup>22</sup> [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岳阳楼记〉，《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卷8，页194。

<sup>23</sup> 余醴，《金庸小说的文化与价值研究》，页63。

“江湖”一词曾现于《庄子·大宗师》：“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煦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sup>24</sup>以地理角度言，“江”乃较大的河流，“湖”指代被陆地所包围的广大水域，“江湖”的原始意义即“江河湖海”<sup>25</sup>。

“江湖”的实指范围由最初的太湖流域逐渐扩大至合肥、番禺、湖北、湖南岳阳、衡阳，至唐朝以后，已涵括整个江南地区<sup>26</sup>。期间，“江湖”虚指的意义亦随着实指的扩张不断变化，开始代指某种隐含脱离政权控制意味的“自由空间”，其不仅包含庄子疏宕潇洒、隐逸遗世的精神气质，亦引申为民间社会对理想世界的美好愿望<sup>27</sup>，历代贤能义士的著述中皆能见此追求和向往，如李商隐“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sup>28</sup>，高适“天地庄生马，江湖范蠡舟。逍遥堪自乐，浩荡信无忧。”<sup>29</sup>，苏轼“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sup>30</sup>，均表现出远离世俗纷扰和束缚的渴望，及追求辽阔无忧的生活情趣。

“江湖”虽蕴含“社会”、“地理”、“文化”等丰富意涵，然其动荡多变的特征却始终如一，如同在险滩急流、深潭漩涡的钓鱼人般，虽渔获之利丰厚，却是需要付出极大的风险和代价<sup>31</sup>。总之，“江湖”是一个不受惯常法律和道德约束，远离朝廷政权与世俗纷扰，超然自由却动荡多变的理想化空间。

---

<sup>24</sup>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干部培训处组编，〈大宗师〉，《庄子》（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页115。

<sup>25</sup> 杨伦，《金庸的江湖研究》（甘肃：兰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2006），页23。

<sup>26</sup> 杨伦，《金庸的江湖研究》，页25。

<sup>27</sup> 杨伦，《金庸的江湖研究》，页26。

<sup>28</sup> [唐]李商隐著、陈永正译注，〈安定城楼〉，《李商隐诗选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页38。

<sup>29</sup> [唐]高适著、刘开扬选注，〈古乐府飞龙曲留上陈左相〉，《高适诗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页79。

<sup>30</sup> [北宋]苏轼著、王水照、朱刚选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页198。

<sup>31</sup> 林保淳，《解构金庸》，页130。

## 第二节 政治性门派

江湖门派是武侠世界的主要结构之一，大致可分为教门、帮会、武学门派三者，各教、各会、各派均有其特定的势力范围，相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封国，分别代表了武侠世界的版图。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权力斗争已非奇事，众门派为争夺武林霸主之位以统一江湖，所展开的攻伐行动极其猛烈，如《笑傲江湖》中的五岳剑派、少林、武当等名门正派，以维护中原武林之纯洁性为理由，与日月神教等邪派进行长达百年的争斗，双方势成水火，杀戮不断。然而，不论众门派的权力斗争如何惨烈，均是武侠世界的内部争斗，从不与世俗世界有任何交涉，二者向来界限分明，这种现象至《鹿鼎记》中却大有不同。

《鹿鼎记》前后共出现天地会、沐王府、丐帮、武当派、神龙教、王屋派、少林派、华山派、铁剑门 9 个门派，其中仅天地会、沐王府和神龙教是以门派形式集体出现，且情节连贯，故严格来说，天地会、沐王府及神龙教方是《鹿鼎记》真正意义上的门派组织。就天地会和沐王府言，天地会的创始祖师乃国姓爷郑成功，因进攻围困江南、江宁失败，在退回台湾以前，接受陈近南（陈永华）的建议，联络旧部，在中土设立天地会，其设立宗旨为“保定大明天子，恢复我锦绣江山<sup>32</sup>”，即“反清复明”，郑成功拥戴唐王隆武帝，陈近南忠于郑家，由其统率的天地会自是以隆武帝为尊。沐王府则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大将沐英沐王府的后人，明朝开国之际，因助朱元璋平服云南，立有大功，故受封云南，乃明朝开国的大功臣。明末，沐英子孙沐天波拥戴桂王永历天子，永

---

<sup>32</sup> 金庸，《鹿鼎记 1》（广州：广州出版社，2013），页 261。

历受吴三桂追杀，逃亡至缅甸，却不料再入险境，沐天波代主而死，沐王府一众能在江湖中得享尊位，受人敬仰，可谓全仗先人的英烈事迹。

天地会和沐王府目标一致，皆是驱除鞑子，“反清复明”，本应统一战线，集结义士，共谋反清大计，再不济也应井水不犯河水，各自为营，可他们却在大事未成之际，因拥唐拥贵此等小事，相互斗殴，自相残杀。天地会徐天川和沐王府白寒松、白寒枫就曾因拥唐拥桂之事，从“志同道合”之友变成“比武决是非”之敌，这场比武本是切磋武艺，可白氏兄弟以二敌一，徐天川为求自保，失手打死白寒松，自身亦伤重险些身亡。武林中人比武，身体残缺或就此丧命皆是寻常之事，谁都无法责怪谁，白寒枫却扬言要屠尽天地会全数会众以报兄仇。若非韦小宝之后设法救出沐家吴立身、刘一舟等人，恐怕天地会和沐王府将会因此结下梁子。事后，沐王府亲自前往天地会，感谢韦小宝的相救之情，大家均和颜悦色，可当话题再次回到拥唐拥桂时，沐家柳大洪却厉声指责：“大明天子的正统，却半点也错忽不得。<sup>33</sup>”，双方再度争执不休。拥唐拥桂当真如此重要？当真紧迫过“反清复明”大业？其实不然，且看李西华所言：

将来驱除了鞑子，崇禎、福王、唐王、鲁王、桂王的子孙，谁都可做皇帝。其实只要是汉人，哪一个不可做皇帝？沐小公爷、柳老爷子何尝不可？台湾的郑王爷、陈总舵主自己，也不见得不可以啊。大明太祖皇帝赶走蒙古鞑子，并没去再请宋朝赵家的子孙来做皇帝，自己身登大宝，人人心悦诚服……至于奉

---

<sup>33</sup> 金庸，《鹿鼎记2》，页466。

立新君，那是赶走鞑子之后的事，咱们只愁打不垮鞑子，至于要奉立一位有道明君，总是找得到的<sup>34</sup>。

李西华一语道破事态核心，明太祖朱元璋当年即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抗元返宋”为口号打平天下，然功成名就之后，他并未恭请赵氏子孙复位，而是另立江山；吴三桂起兵造反，亦是以“兴明讨虏”，拥戴朱三太子为由，然其真实意图却是自立为皇。中国人讲究“师出有名”，必须用冠冕堂皇的名头包装自己的侵略野心，越是名正，越得天下诚服，天地会和沐王府亦复如是，“反清复明”就是他们的旗帜。若天地会和沐王府果真是为了国家大义而反清复明，确实值得敬佩，可正如李西华所言，当务之急是驱除鞑子，奉立新君乃是复国以后的事情，天地会和沐王府始终在唐桂之争中不肯让步，似是各有所忠，实则却是以忠义之名争夺抗清领导权。

抗清领导权就如同武林霸主之位，得之可号令全武林的忠诚义士共图反清大业，待新政权建立，拥有抗清领导权的一方，自是身具拥护之功，成为开国大功臣，且身处政治权力的中心，一世荣宠更是享用不尽。在此前提下，拥唐拥桂自是比反清复明来得重要，因其直接决定双方日后的政治地位，而猎杀吴三桂则成为抗清领导权的代表，优先诛杀或逼吴三桂造反者，即是抗清领导权的拥有者。天地会和沐王府为夺取抗清领导权，可谓是不择手段，最典型的例子，即韦小宝奉命保护建宁公主前往云南成婚，沐王府计划杀死建宁公主，利用保护不周之大罪逼迫吴三桂造反。韦小宝作为送婚使，公主若不测身亡，其

---

<sup>34</sup> 金庸，《鹿鼎记2》，页471-472。

势必受到牵连，沐王府却不顾昔日的相救之情，欲陷韦小宝于不义，以期赢取抗清领导权之位，试问这又是怎样的“国家大义”？

神龙教应是《鹿鼎记》中最像江湖门派的教会，从表面看来，其符合武侠小说邪派教会的一切特征，如善用毒物、驭下严厉、行事非常、口号诡异等。然则，神龙教的教主洪安通的野心却不止于“一统江湖”，其暗中接受罗刹国的敕封，和罗刹国、蒙古、西藏、吴三桂结盟，意欲瓜分中国包括台湾及海南岛在内的所有沿海岛屿。为扩张势力范围，神龙教同西藏和蒙古均在全力争夺《四十二章经》以及顺治皇帝。《四十二章经》非寻常佛经，其中隐藏着极大的机密：满清最初未曾想过能入主中原，只盼能长占关外便心满意足，故入关之后，就大肆搜刮金银财宝，全数运至关外收藏。为防止宝藏失窃，满清将藏宝地图撕成千片，并分为八份，藏入八部《四十二章经》中，交由八旗旗主看守，其宝藏之丰，可保满族族人衣食无忧。神龙教派毛东珠潜入皇宫假扮太后，将收集《四十二章经》列为本教首功，为的就是经书中的巨额财宝。倘若神龙教持有宝藏，不仅可以大规模地壮大教会，更可以雄厚的资金后盾作为谈判条件，向吴三桂等要求更多的领地。因吴三桂反清只许胜不许败，正是急需支援之时，除非必要，否则吴三桂不会轻易拒绝神龙教，以致降低成功的机率，且吴三桂卖国成瘾，以土地换取成功机率，于其而言，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若谈判失败，神龙教大可自行招揽教众，逐步扩张自身的政治势力，彼时清廷和吴三桂皆在备战，根本无暇顾及神龙教的动态。

此外，顺治皇帝未死，在五台山清凉寺出家的消息一经泄露，神龙教与各方势力皆迅速派手下前往抢夺。劫持顺治皇帝，大致有两大好处：其一，顺治皇帝必然知道宝藏埋藏地点，若能逼诱顺治开口，可省去收集八部《四十二章

经》的精力。神龙教一有雄厚资金，二有顺治，筹码极大，甚至可跳过吴三桂，直接和康熙谈判，吴三桂为防止此事发生，必定会同意神龙教的要求。其二，顺治皇帝可起到投鼠忌器之效，吴三桂兴兵之时，将顺治皇帝安置在前锋，即可牵制清军，使其不敢妄动。假若康熙不顾父皇安危，坚持抗战，将会落下不仁不孝之骂名，在中国如此注重仁孝义的国度，君王不仁不孝将难以治国，加之清朝根基尚未稳固，康熙绝不可能出此下策。一旦吴三桂胜利，即可兑现神龙教的条件，吴三桂日后若想收回神龙教的领地，等同于向西藏蒙古宣战，故这些领土在吴三桂根基稳固之前，皆可作数。从神龙教训育教众的方式来看，洪安通俨然有称帝的野心，洪安通虽爱听恭维之语，但其机警不输韦小宝，才智不输康熙，他清楚得知，以神龙教一教之力，是无法撼动清朝，成为中原之主，故而选择和吴三桂结盟，一同瓜分中国，谋求领地，称霸一方。

### 第三节 “侠”之起源与确立

侠客起源之论述，以顾颉刚的观点较为权威，其在《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中言道，侠客最早起源于士：“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力，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至孔子之时，“士”尚文武双全，每有国难，皆能奋身而起，勇敢御敌。孔子逝世以后，其门人子弟逐渐倾向内心修养，不重武事，此些专注内心修养，以学问、技能谋仕途的知识分子，称之为“文士”；其他尚武，以武干禄之士，称为“武士”，自成集团，不与“文士”混同。至此，



“士”分化成“文”、“武”两大集团，“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意气<sup>35</sup>。

“儒”或“侠”，皆从属于士阶层，春秋战国时期，自封建制度破坏后，士便从“最低等之贵族”下降为以出仕为谋生手段的平民，与农民并无地位高低之分。各诸侯为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取胜，急需大量的专业人才，文士与武士皆可在不事生产的情况下获得优质生活<sup>36</sup>。私学的兴起，就是以补充官僚阶层为目的培育专才，接受私学教育的平民，便可跻身于士阶层，获得社会的认可。士阶层的不断膨胀，造成官僚编制饱和，难以找到职位的士，只好游走于诸侯邦国，凭借专业技能谋生，或推销治国方略，或提供武力剑术服务。如此，士在儒侠的基础上，又再度分化出“游士”，其乡土情节及邦国归属感因时常奔走而有明显的弱化。新兴武士亦随着“游士”的出现产生，取其居无定所、无职无位、浪荡江湖之特征，故称其为“游侠”<sup>37</sup>。早期形态的游侠，有其特定的“职业道德”，在不违背“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只要获得酬谢或封建主的恩惠，便可为其赴汤蹈火，无所不为<sup>38</sup>。其中生活困窘或渴望建功立业者，就投身权门，充当封建主及王公贵族的私剑，负责保护主人的人身安全，或为其消除政治上的异己<sup>39</sup>。另有淡薄名利，远离政治纷争者，坚守游侠的“职业道德”，又行“不轨于正义”，故遭受诸侯排斥，终致名声不显之局面，可谓是“侠”之前身<sup>40</sup>。私剑与游侠不同，投身权门意味着违背游侠的“职业道德”，已不列

---

<sup>35</sup> 顾颉刚，《史林杂识》（香港：中华书局，1963），页 88-89。

<sup>36</sup> 杨伦，《金庸的江湖研究》，页 7。

<sup>37</sup> 杨伦，《金庸的江湖研究》，页 8。

<sup>38</sup>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页 46。

<sup>39</sup> 杨伦，《金庸的江湖研究》，页 9。

<sup>40</sup> 杨伦，《金庸的江湖研究》，页 10。

于侠位，司马迁将荆轲列入〈游侠列传〉，而非〈刺客列传〉，就说明游侠是一股非政治的平民化的民间力量<sup>41</sup>。

“侠义”精神的确立标志着游侠内涵之趋向完整，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称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sup>42</sup>刘若愚在《中国之侠》中将侠义内涵归纳为八点：一、助人为乐，施恩拒报；二、主持公正；三、崇尚自由；四、效忠于知己；五、身心勇敢；六、诚实，已诺必践；七、重视名誉；八、慷慨轻财<sup>43</sup>。田毓英亦总结 11 条侠之美德：一、重然信诺；二、言必信、行必果；三、舍己为人，济困扶危；四、谦虚；五、羞于赞美自身的德行；六、自定取舍予夺的标准；七、重视信誉之规则；八、声名远扬，却不刻意提升名誉；九、舍身赴义，坚定自我；十、修善行德；十一、设法改善自身之行为及美名<sup>44</sup>。谈及侠义内涵的论点繁多，大致可总结为：侠义的基本精神乃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大至保家卫国、保国安民，小至锄强扶弱、济困扶危。侠客是一群“利他性”的群体，从不考虑自身利益，爱情、亲情、忠义均可让位于替天行道、爱民护民。他们关注世态民生，以百姓安乐为己任，将自身视为“天理”的维护者和改良者<sup>45</sup>，望能在国家统治权力之外替百姓伸张正义，故得百姓之爱戴。

---

<sup>41</sup> 杨伦，《金庸的江湖研究》，页 16。

<sup>42</sup> [汉]司马迁撰、[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游侠列传〉，《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卷 124，页 3865。

<sup>43</sup> 刘若愚著、周清霖、唐发铨译，《中国之侠》（上海：三联书店，1991），页 3。

<sup>44</sup> 田毓英，《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台北：商务书局，1986），页 73。

<sup>45</sup> 马玉石，《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历程看侠义精神的流变》（甘肃：兰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10），页 12-13。

游侠始于特定阶层，却在历史进程中逐渐丧失身份标识，凡向往侠义之道者，皆可成为游侠，无须官方权威机构认可授权，因侠之形成是建立在侠义精神的富足与否。游侠虽无法显于正史之中，然其以一种文化表征和民间标识广受民众认可<sup>46</sup>，较留诸正史更具影响力。

#### 第四节 “侠”之变质

武林聚会之重大，不仅关乎武侠世界之世运，亦关乎全武林成员的命运。武侠世界极其凶险，聚会之结果常会危及某一部分成员的身家性命及其江湖地位。是故，无论大小门派或侠客，皆会竞相奔赴，以便在结果不利于己时，力挽狂澜，而武林聚会群豪所商议之主题，是最能体现众武林成员的集体心态<sup>47</sup>。

《鹿鼎记》中的武林聚会，名为“杀龟大会”，“龟”乃“桂”之谐音，代指吴三桂，此次集聚群豪所欲商议之事，就是诛杀吴三桂。在聚会中，群豪皆表现出对吴三桂的极度怨恨，恨不能生食其肉、死啃其骨，所想对付吴三桂的计策虽无实用价值，但都异常毒辣，可见，群豪的集体心态均指向歼灭大汉奸吴三桂。吴三桂当初引清兵入关，天下皆唾之，武林群豪更是视其为断送大明江山的罪魁祸首，对其恨之入骨。吴三桂归降清朝后，爵封平西王，镇守云贵两州，武林群豪皆欲杀之而后快，以“解救”被吴三桂“坑害”的无辜老百姓，并为明朝复仇，实现反清复明大业的一大步。不过，诛杀吴三桂究竟对百姓有何益处？能为天下苍生解决什么危难？且不言《鹿鼎记》全文除武林聚会外，未有吴三桂残害百姓的例证，即便成功击杀吴三桂，清廷亦会委派新任平

---

<sup>46</sup> 林海，《论武侠世界的审美建构》（湖北：中南民族大学，2009），页9。

<sup>47</sup> 舒国治，《读金庸偶得》，页75。

西王，不仅无法“解救”百姓，还替清廷解决了心腹大患，间接稳固满清的根基，于反清复明大业实为一大打击。如此，武林群豪为何坚持剿灭吴三桂呢？

武侠世界中有一个官方认可的“诛杀榜”，凡成功刺杀上榜者，其声名地位将会在一夜之间响彻全武林，成为人人钦佩的大侠，故而上榜者，将面临全武林的追杀，而吴三桂正是武林“诛杀榜”的榜首。传统侠客本是不刻意追求名誉，且羞于赞美自身德行，可事实上，侠客一旦踏入武侠世界，就须花费一生的时间与精力培植、巩固门派或个人的名誉，必要时，甚至不惜舍命捍卫名誉。名誉之所以如此重要，乃因其决定侠客在江湖中的地位、尊严、资源以及话语权。立志闯荡江湖，却毫无名誉者，是如同蝼蚁一般的存在，被天下豪杰所不齿，简言之，名誉是武侠世界权力比重的分配标准，名誉愈高，权力比重愈大；名誉愈低，权力比重愈小，故“赢得生前身后名”是大多侠客的志向，他们愿为此付出一生，而获取名誉的最佳途径就是刺杀武林“诛杀榜”的上榜者。《鹿鼎记》的武林“诛杀榜”，除吴三桂外，尚有鳌拜，韦小宝就是在擒杀鳌拜后，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市井小人一跃成为人口相颂的小英雄，“擒杀鳌拜”亦成为其日后行走江湖的金牌通行证，只需出示此证，不仅人人起敬，更可化险为夷。韦小宝之能成为青木堂香主，得娇俏丫头双儿，化独臂九难为师，此证皆起了重要功效。同理，武林群豪如此热衷于诛杀吴三桂，乃因其所具备的价值犹如登天之梯，优先取其性命者，声名地位等皆可飞跃提升，拥有主要的权力比重，“诛杀吴三桂”将会成为其终生受用不尽的资本。在武林聚会中，群豪共分为一十八个“锄奸盟”，各自为营，商讨诛杀吴三桂之计，实则皆在暗中较量，争取领先之机，毕竟一个吴三桂只能成就一个门派或一位侠客。

“杀龟大会”还体现了武林群豪另一个集体心态，即反清复明，奔赴“杀龟大会”者均是有意参加或愿暗中协助反清大业的侠客，诛杀吴三桂与反清复明只是次序先后的问题，本质上是同一件事。前文只是论述天地会和沐王府的抗清领导权争夺之战，却并未从意义层面去探讨及证明武林群豪的野心。所谓“反”是有其先决条件的，即现有政权腐败，导致民不聊生、流离失所，人民为摆脱困境，而奋起抵抗，推翻现有政权，拥立新政权，以期迎来新光景。综观康熙一朝，百姓远离战火，安居乐业，民生富足，且国势强盛，较汉人江山还要昌盛，“反”的理由何在？意义何在？武林群豪给出的解释是百姓在满人的统治下生活得水深火热，其一直抓着“明史”案而大肆苛责满清政权的残酷。然文字狱并非清廷的专属，其只是统治者的惯用手段，明太祖朱元璋一朝所实行的文字狱可不比清廷来得少。“反清”势必再度发生战火，那好不容易富足安稳的百姓又得遭受战火的折磨，四处逃难，离乡背井，重新体会家破人亡的痛楚，那才是真正的水深火热。独臂九难眼见因争夺《四十二章经》而害死的十数条性命，亦不禁长叹：“……这夕阳所照之处，千关万山，尽属胡虏，若要复国，不知又将杀伤多少人命，堆下多少白骨，到底该是不该？”<sup>48</sup>，且明朝数任皇帝，无一胜过康熙，纵观汉人皇帝，胜过康熙的又有几任？百姓重回明朝统治，生活不见得会富足安乐。如此，坚决反清复明的侠客义士，其爱民护民之心何在？

以当世豪杰陈近南为例，其明知：“百姓对前朝渐渐淡忘，鞑子小皇帝施政又很妥善，兴复大业越来越渺茫。”<sup>49</sup>，却仍旧一意孤行，所为的并非是国家

---

<sup>48</sup> 金庸，《鹿鼎记 3》，页 931。

<sup>49</sup> 金庸，《鹿鼎记 4》，页 1197。

大义，而是对国姓爷的愚忠。“士为知己而死”，陈近南得国姓爷赏识，赐以国士之位，便想以国土相报，与其说陈近南忠于前明朱家，不如说是忠于台湾郑家，即便郑克塽屡次欲取其性命，陈近南行事仍以台湾郑家的利益为主，天地会成员苏冈就曾在与归氏夫妇、沐王府共商反清大事时，当面质问陈近南：

“陈总舵主这话，是不是有些为台湾郑王爷打算呢？<sup>50</sup>”从此角度来看，陈近南俨然是台湾郑家的门客，其反清复明是为郑家消除政治异己，属于下属对上帝的忠心，已无法列入侠位，应归入私剑一党。传统侠客崇尚超然自由，不属于任何政治势力，不听命于任何人，如此，方能不受牵制地以世态民生为重，在百姓需要帮助时立即伸出援手，而陈近南从投身权门，决定从属于郑家势力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脱离侠位。金庸虽未言之露骨，但陈近南的利益早已与郑家融为一体，共荣共亡：“陈近南一向对郑经忠心耿耿，他女儿又嫁克臧为妻，董夫人和冯锡范等暗中密谋，知要拥立克塽，必须先杀陈近南，以免他从中作梗，但数次加害，都为他避过。<sup>51</sup>”可见，陈近南为拥立女婿克臧继位，亦参加了郑家内部的夺位之争。

至于沐王府乃明朝世袭黔国公，威权鼎盛，尊似亲王，故世人称之为沐王府。然至清朝时家道中落，流落江湖。是故，其反清复明之目的显而易见，即光复门楣，重现昔日荣耀。清朝不可能重用前明势力，其唯有扶持汉人新帝，再立开国之功，方能重登爵位。另有部分侠客，如吴六奇、归氏夫妇等，不为荣华富贵，不求显贵功名，然促使其反清复明的却是狭隘的满汉之分。对他们而言，汉人便是好人，满人便是坏人，即便恶如吴三桂，也可因其是汉人而从

---

<sup>50</sup> 金庸，《鹿鼎记 5》，页 1491。

<sup>51</sup> 金庸，《鹿鼎记 5》，页 1586。

宽处置。汉人血统高贵，满人是卑贱的鞑子，高贵之人怎可受卑贱鞑子统治，故其势必要将满人赶出关外，另立汉人新帝。

总而言之，三其之反清复明有两个共同点：其一、不顾百姓。武林群豪商讨反清复明之计时，均未考虑天下百姓的感想，百姓最关心的是基本的生计问题。他们并不在乎谁人身登大宝，只要新帝施政良善，百姓粮食充足，安居乐业，不必颠沛流离，四处逃难，便已心满意足。群豪明知情况如此，却仍旧为了一己私利，欲挑起满汉之战，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其二、反清是真、复明是假。“复明”只是“反清”行动的正名，武林群豪只需扶立汉人为帝就可达成所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顾炎武等人恭请韦小宝自立为皇的片段。顾炎武和陈近南并列为“锄奸盟”的总军师，在江湖中极具威望，可谓是“反清复明”的代言人，当其决定规劝韦小宝兴兵起义，讨伐康熙时，就提及武林群豪届时定会纷纷响应，拥护韦小宝成为皇帝。如此，他们等于承认“复明”只是个噱头，只要能够成功反清，新君又是汉人的话，谁来担任都可接受。

## 第三章 世俗侠客：新武侠世界的基石

### 第一节 武侠世界的挽歌

武侠世界世俗化是一个必然的进程，游侠从特定阶层演变至平民化群体，使得侠客数量不断增多，当到了一定数量时，武侠社会就会形成，随之而来的便是权力结构和等级制度的分配。人对权力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侠客亦无例外，武林之中有武林霸主之争，门派之中有掌门之争，侠客之中有名誉之争，不同等级均有各自的权力和势力，但皆须听从武林霸主的至高号令，侠客对权力的角逐，终会让逍遥自在的武侠世界变成另一个世俗世界。而不受法律约束，可随意厮杀的武林群豪将会在一场又一场的权力争夺战中，走向消亡，陈近南的悲惨命运，便是武侠世界之挽歌。

马玉石曾言：“乱世不仅是武侠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也是它得以发展壮大社会基础，金庸的很多作品都是以中国历史上的乱世作为背景。<sup>52</sup>”此乃武侠界之通论，换言之，侠客产生并生存的条件是乱世，失去乱世的庇佑，侠客将无法生存。时代正在飞速进步，法治社会随之诞生，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使侠客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现代社会讲究人人平等、自律和自由，侠义精神只是一种美德，而非主流。法治社会给予人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基本权力，法律所提倡的公平公正成为现代社会待人处事的基本原则，以武力替天行道的侠客只会被冠以“暴力”、“莽夫”的标签。在大和平时代，人们更不希望武功随处可见，以仗剑行侠为终身信仰和职业的侠客，被时代淘汰亦是必然的。

---

<sup>52</sup> 马玉石，《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历程看侠义精神的流变》，页 15。



时代变迁的冲击以及内部侵蚀的危机，都将武侠世界带向消亡的结局，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在结局来临之前，重塑武侠世界，将侠义精神改造成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且符合人性的新模式。是故，金庸在《鹿鼎记》中加速了武侠世界世俗化的进程，以期重塑江湖，而韦小宝就是金庸塑造新武侠世界的关键所在。

## 第二节 世俗侠客的诞生

韦小宝作为金庸笔下的新型侠客，一直受到诸多质疑，否认韦小宝之侠客身份的读者，多以其武功低微、贪财好色、手段低劣、毫无侠义等作为理由<sup>53</sup>。本章之主要内容实是为韦小宝辩护，辨明其非但不是贪财好色之徒，反具有侠义精神，而韦小宝之身份如何，对金庸新武侠世界之建造成功实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陈平原曾言：“照通行的说法，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也即讲述以‘武’行‘侠’故事的小说。<sup>54</sup>”以“武”行“侠”的定义显露“侠”为主体的意涵，文人可以“文”行“侠”，说客可以“言”行“侠”，武人自是以“武”行“侠”。“武”是达至“侠”的方法，故无“武”行“侠”亦无任何不妥之处，“侠”方是需要继承传扬的精神美德。武功讲究练武之人的天赋、心性和毅力，非常人所能练，亦非人人皆有慧根悟透武学义理，依韦小宝之生活环境和性格特征言，若描述其练就绝世武功，是一大败笔，因游走于市井间的韦小

---

<sup>53</sup> 否认韦小宝之侠客身份的四大理由，笔者总结于倪匡先生之著述：倪匡，《再看金庸》（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页11-26。

<sup>54</sup>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页116。

宝，清楚知道武功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亦不是最佳方案，更不是必备技能。韦小宝曾在被建宁公主绑住手足，无法挣脱之际，质疑道：“老子师父拜了不少，海大富老乌龟是第一个，后来是陈总舵主师父，洪教主寿与天齐师父，洪夫人骚狐狸师父，小皇帝师父，澄观师侄老和尚师父，九难美貌尼姑师父，可是这一大串师父，没一个教的功夫当真管用。<sup>55</sup>”且在法治社会中，武功至多只被允许以强身健体的形式存在，能够适应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变，亦只有如韦小宝般的市井之人。

众多读者指责韦小宝贪财，应是因其时常利用官职搜刮财富，然贪财之“贪”，乃“贪婪”之意，意即攒取超过自身需求的钱财，却仍旧不知足。然，韦小宝之于钱财只是一种需求，自小的生活环境告诉他，财色是重要的人生资源，人不论在哪生活，钱财富足总比穷困潦倒来得好。韦小宝之左右逢源，好友兄弟遍及各个势力，钱财可是发挥了重要的疏通作用，韦小宝虽未赠与十八罗汉和独臂九难一银半两，但沿途车马住宿，丰盛素食亦破费不少，更别提犒赏属下、贿赂同僚等输出。韦小宝敛财丰厚，却散财有道，并不吝啬于钱财的输出，如此是贪财乎？韦小宝明知鹿鼎山藏有巨额宝藏，明明有多次机会可以挖掘，可只要一想到此举可能会危害到康熙的性命，便打消念头，直至其退出江湖为止，都再未踏入鹿鼎山半步；台湾台风成灾，导致百姓家破人亡，康熙为此忧心忡忡，韦小宝为替好友分忧，愿捐赠一百万两赈灾银，如此是贪财乎？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的双重逼迫下，愿放弃高官爵禄，携妻带子逃回扬州，从此隐姓埋名，不再过问政事，相较于武功高强的冯锡范，因贪图荣华富贵，宁愿被毫无武技的侍卫打得奄奄一息，也不愿还手，如此是贪财乎？若韦小宝

---

<sup>55</sup> 金庸，《鹿鼎记3》，页1039。

当真是贪财之小儿，当初面对茅十八的十两元宝，怎会说出：“咱们只讲义气，不要钱财<sup>56</sup>”之语，须知当时韦小宝生活贫苦，平时一两银子都未曾得，却能以十二三岁的贫童抵御金钱之诱惑，如此仍是贪财乎？以上种种作为足以证明其并不贪财，当得起“侠”的称号。

批判韦小宝好色之读者，想必是从未动情，好色是“喜好美色”之简称，此乃人之天性，无从辩驳，韦小宝确实好色，可又有多少人敢断言自身不喜美色？然则，韦小宝却懂得“朋友妻，不可欺”之理，阿琪是葛尔丹的情人，韦小宝与葛尔丹虽是因利益而结拜，无甚兄弟之谊，但对韦小宝而言，结拜即兄弟，兄弟的情人即使再美亦不可玷污。

武林中人闯荡江湖极为重视江湖手段，讲求光明正大，如韦小宝般撒石灰、捏阴囊、剁脚板、偷奸耍滑等，最为武林中人所不耻，茅十八就曾厉声厉色地喝其为“下三滥”手段，不喜《鹿鼎记》之读者亦常以此来指摘韦小宝。然，手段高明与否当真代表使用者的品性吗？金庸早在书中借何惕守之口驳斥此种观点：

什么下作上作？杀人就是杀人，用刀子杀人，用拳头杀人，下毒用药，还不一样是杀人？江湖上的英雄好汉瞧不起？哼，谁要他们瞧得起了？像那吴之荣，他去向朝廷告密，杀了几千几百人，他不用毒药，难道就该瞧得起他了<sup>57</sup>？可见，江湖手段之本质根本无关正义或邪恶，关键是使用者的目的、性质，其目的是杀人，故手段不论多么高明，也无法美化或掩盖其杀人的低劣品性。韦

---

<sup>56</sup> 金庸，《鹿鼎记 1》，页 45。

<sup>57</sup> 金庸，《鹿鼎记 5》，页 1470-1471。

小宝身不具武，腹不着墨，当遇到危机，或欲救人于危难时，除了使用所谓的“下三滥”手段外，就别无他法，就其使用手段的目的而言，自保与救人，难不成是羞于启齿之事？韦小宝用此手段救下茅十八、方怡、沐剑屏、沐王府一众、陶红英、康熙、顺治以及天地会会众等，较之“一剑无血”冯锡范先后用剑偷袭陈近南、吴六奇，及郑克塽趁陈近南不备用剑将之刺死的“正派武林高手”，谁是英雄？谁又下作？此即判然二分。韦小宝从未主动杀人，皆是在生命搏击时的不得已行为，若韦小宝不下狠手，那他自身便会性命不保，“生存第一”是其一贯的作风。自小以“小杂种”身份长大的韦小宝，其生存环境极为艰苦，他的生命在母亲之外的人的眼里一文不值，任何人皆可对其拳打脚踢、嘲笑谩骂，故而他比一般的市井之人更为重视生命，因其不珍视，便无人挂心，而生活平静、幸福的人们又有何资格去批评韦小宝“下作”的生存手段呢？

金庸曾在中山大学的教授大会上给予“侠”一个新的定义：“能够不顾自身利益而去主持正义，挺身而出的重视是非的行为就称之为侠……所以见义勇为就是一种侠的行为<sup>58</sup>”。韦小宝之“侠义”其实从一开始就已显现：其为躲避盐商追打，无意躲入茅十八厢房，彼时茅十八正与盐商激烈斗殴，本想悄悄逃走的韦小宝，眼见茅十八逐渐气弱，恐有生命之危，便立即疾冲而前，救下茅十八，此即见义勇为。其明知与茅十八若牵扯过深，会被盐商误认为是同党，会有性命之忧，但仍旧坚持陪伴茅十八前往得胜山。随后韦小宝得知茅十八便是价值一千两赏银的通缉犯后，仍能坚持本心，不去报官，此即不顾自身利益。次日，官兵前来抓拿茅十八，韦小宝大可趁乱逃走，可其秉持“有难同当，有

---

<sup>58</sup> 金庸，〈武侠与人生——在中山大学就聘名誉教授大会上的学术报告及答读者问〉，页 3。

福共享”之信念，在茅十八险些丧命之际，及时以石灰和单刀救之，此即挺身而出。

另，韦小宝、独臂九难、阿珂、郑克塽同行，因身有《四十二章经》而被众喇嘛追杀。韦小宝为救九难和阿珂性命，亦为取得阿珂之青睐，就毅然与众喇嘛比武，其身不具武，唯有凭借油嘴滑舌、以假乱真之法，暗中以匕首击倒对方。但同一种方法无法一直使用，韦小宝最后竟敢言自身早已练就“金顶门”神功，并透露腹部神功未就的弱点，以性命作为赌注，博对手会砍其腹部（有宝衣保护），若对手坚决砍其脑袋，韦小宝自此一命呜呼，试问世间又有几人有胆将脑袋放在敌方刀下，其目的就为了解救师父和心上人？最能体现韦小宝之义气，亦最受争议的力证莫过于韦小宝逃宫解救天地会会众，令其免受炮轰一事，陈墨言韦小宝之“义气”是建立在不能损害自身根本利益的前提之下，“舍身赴义”并非其行事风格，典型的例子即韦小宝为向天地会报信而一刀刺向多隆胸口，体现韦小宝之于“义气”的轻重之分<sup>59</sup>。笔者并不十分认同陈墨所言，假若韦小宝选择留下，相等于对康熙表示绝对忠诚，以二者的交情言，韦小宝将会得到一生都打不破的金饭碗，如加官进爵、金银财宝、娇妻美妾，皆可收入囊中。不仅韦小宝一人，连同其母亲、妻儿均将成为人上人，而其却选择逃宫报信，抛弃荣华富贵，豁出性命，康熙虽珍惜与韦小宝的总角之谊，但其真正身份乃是帝王，韦小宝若把握不好分寸，令康熙认为其有可能威胁王朝利益，照样会取其性命，而这一切只为了搭救天地会群英，如此难道不是“舍身赴义”之表现吗？韦小宝刺死多隆实属逼不得已，彼时之境况注定会有牺牲，韦小宝倘若听从康熙安排，天地会一众势必命丧黄泉，连尸体都无法留全。韦

---

<sup>59</sup> 陈墨，《重读金庸》，页321。

小宝决心搭救天地会群英，在无法拉拢多隆的情况下，只有痛下杀手，方能减少牺牲。世间至难之事莫过于两全，韦小宝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做出是非判断已非常人所能行。

韦小宝虽出生于市井之间，但其自幼便听说书先生讲述《三国志》、《水浒传》、《大明英烈传》等英雄故事，对其中义薄云天的英雄好汉极为心醉，而其行事亦以此为基准。韦小宝是最为普通的常人，无家世背景，亦无学历，有着最原始的人性欲望，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但就是这位在部分读者眼中，武功低微、贪财好色、手段低劣、毫无侠义之徒，竟冒着生命危险，又放弃高官爵禄，毅然地为了“朋友义气”拯救天地会众人，此举放眼全武林，又有几位“大侠”能做到呢？须知，当“利”字当头，为了心中“义气”做出无益甚至有害于自身根本利益的“侠义”之举时，方是真的伟大。韦小宝从未受过系统的道德教育，却屡次能在关键时刻战胜人性弱点，以义气为重，故他绝对当得起“世俗侠客”之称号。

## 第四章 结论

金庸武侠世界之世俗化，在“神雕三部曲”中就已现端倪，《鹿鼎记》之诞生更是直接宣告世俗化之完成，因其完全颠覆金庸以往武侠小说的模式，甚至被称为“反武侠小说”，殊不知其中蕴藏着金庸对武侠世界的新思考。本文尝试以《鹿鼎记》为中心，论证金庸武侠世界世俗化之形态，并解答金庸为何世俗化其武侠世界，以及韦小宝在其中具备怎样的象征意义，总此设法总结金庸武侠世界的新出路。通过对武侠世界三大要素，即江湖帮派、侠客豪杰和侠义精神的剖析，及与世俗世界的相比较，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江湖本是远离朝廷政权和世俗纷扰的理想世界，不受惯常法律和道德约束，虽言武侠世界随着武侠人口的增加，及权力结构的完整化，已然不似最初的超然、宁静和自由，但武林中人对世俗世界，尤其是庙堂不屑、厌恶甚至讥讽的态度却全然不变，不论如何争斗，其主题始终围绕在夺宝、复仇、习武、争霸，从不以立身于世俗世界为追求。反观《鹿鼎记》，其中三大帮派天地会、沐王府、神龙教均以跻身庙堂作为毕生追求，天地会和沐王府为确立日后的政治地位，因而相互争夺抗清领导权；神龙教则与三方政治势力结盟，以期瓜分中国领土，称霸一方。武侠世界成为他们暂时的栖息之地，代表世俗世界至高权力的庙堂方是他们的立身之所，其心志欲望的转变，就是武侠世界世俗化的证据之一。

侠客发展至《鹿鼎记》已完全丧失侠义精神，由“利他性”群体转变成“利己性”组织，他们关注点亦从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保家卫国、爱民护民转变成对金钱、权力、名誉、爱情等世俗之物的追求，如今甚至将野心扩大至庙堂之中，参与“逐鹿之争”。侠客依旧满口侠义道德、国家大义，实则却是

站在“政治正确”的至高点，以反清复明，解救天下苍生为由，以之合理化自身谋求私欲的行为，只要他们扬起“反清复明”之旗，一切破坏和杀戮均可视为正义的、无私的，甚至是为国为民的。侠客沦落了，他们已不再具备纯洁、高尚的人格，全身充满着贪欲、阴谋、奴役等的人性缺点，武侠世界已成为世俗世界的翻版，而这却是由侠客一手堕落造成的！

随着江湖权力之争的激化，以及法治社会的诞生，武侠世界消亡乃是必然的结局，金庸为避免武侠世界走向毁灭，故而加快其世俗化的进程，以期在结局来临之前重塑武侠世界，并塑造能够顺应时代，且符合人性的新型侠客。金庸武侠世界之中的理想大侠，如郭靖、杨过、周伯通、段誉、虚竹等人，皆是难得一见的英雄，可他们最终不是自杀，便是选择归隐，这无疑透露理想大侠难以在人世间生存的事实，其崇高的人生追求终究是与欲望纵横的人间格格不入！可侠客一一选择归隐，不问世事，侠义精神又由谁来继承，又由谁将侠义之光传播至民间呢？陈近南等人均为“反清复明”奔走，只有韦小宝一人是以世俗世界为主要的的生活场域。侠义精神若能以正面积极的方式妥善发扬，将会推动社会走向更美好的未来，金庸塑造韦小宝“世俗侠客”的形象，就是想告诉大家：欲望和侠义是可并存的，只要心中存有侠义之心，在关键时刻，欲望能够让步于侠义，做出不顾自身利益而重视是非的正义之举，那就是“侠”。是以，武侠世界的出路就在世俗世界中，未来可能会发展出“人人为侠”的新武侠世界。

揭露金庸武侠世界世俗化的学术研究已非新题，然多是以江湖权力斗争、侠客类型、侠义精神流变等课题为主，以金庸封笔之作《鹿鼎记》为中心，有系统地从江湖帮派、侠客豪杰和侠义精神的变质论证金庸武侠世界的世俗化，



并通过确认韦小宝侠客身份说明金庸世俗化其武侠世界之构成的学士论文，本文应是首篇。不过，碍于学识有限，无法依照作品顺序着重分析金庸创建武侠世界的思想流变，实属本文的一大不足，同时也因时间有限，故无法探讨武侠世界要如何才能世俗世界稳定的发展，此亦是本文的一大缺憾，如今只能寄望未来有时间能再进行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 引用书目

### (一) 专书

1. 陈墨，《初探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
2. 陈墨，《赏析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
3. 陈墨，《重读金庸》，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
4. 陈岸峰，《醍醐灌顶：金庸武侠小说中的思想世界》，香港：中华书局，2015。
5. 陈岸峰，《文学考古：金庸武侠小说中的“隐型结构”》，香港：中华书局，2016。
6. 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武侠小说类型研究》，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
7.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8. 顾颉刚，《史林杂识》，香港：中华书局，1963。
9. 金庸，《笑傲江湖》，广州：广州出版社，2013。
10. 金庸，《飞狐外传》，广州：广州出版社，2013。
11. 金庸，《鹿鼎记》，广州：广州出版社，2013。
12. 林保淳，《解构金庸》，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8。
13. 刘若愚著、周清霖、唐发铨译，《中国之侠》，上海：三联书店，1991。
14. 林海，《论武侠世界的审美建构》，湖北：中南民族大学，2009。
15. 倪匡，《再看金庸》，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
16. 舒国治，《读金庸偶得》，台北：远流出版社，2007。
17. 田毓英，《西班牙骑士与中国侠》，台北：商务书局，1986。

18. 余醴，《金庸小说的文化与价值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6。

## （二）专书（古籍）

1. [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14。
2. [唐]高适著、刘开扬选注，《高适诗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3. [唐]李商隐著、陈永正译注，《李商隐诗选译》，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
4. [宋]范仲淹著、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5. [北宋]苏轼著、王水照、朱刚选评，《苏轼诗词文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6. 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干部培训处组编，《庄子》，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

## （三）期刊论文

1. 柴高洁，〈从场域理论看《鹿鼎记》对“江湖”的反叛与再造〉，《华文文学》2018年第6期，页17-24。
2. 高良，〈《鹿鼎记》：一个新武侠时代的终结〉，《改革与开放》2014年第19期，页79-81。

3. 金庸，〈武侠与人生——在中山大学就聘名誉教授大会上的学术报告及答读者问〉，《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页1-4。
4. 骆寒超、骆曼，〈从武侠英雄的建构到解构——兼论《鹿鼎记》的先锋意识〉，《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页162-166。
5. 朱艺蓉、王照年，〈解读《鹿鼎记》中韦小宝的“侠”形象〉，《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页80-84。
6. 张乐林，〈解构中的建构：《鹿鼎记》中韦小宝形象的塑造〉，《中州学刊》2009年第2期，页218-220。

#### （四）学位论文

1. 马玉石，《从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历程看侠义精神的流变》，甘肃：兰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论文，2010。
2. 杨伦，《金庸的江湖研究》，甘肃：兰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2006。

